

高兹生态理性思想研究

黄 丹

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西 桂林

收稿日期: 2025年6月8日; 录用日期: 2025年6月29日; 发布日期: 2025年7月10日

摘 要

高兹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代表之一, 高兹以对经济理性的批判为起点, 揭示了经济理性对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异化效应, 提出应从理念层面的超越、革命主体的重构、劳工战略的实施与文化转型四个方面建立起新的理性形态即生态理性。但高兹夸大了生态危机的作用, 对未来社会主义的设想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因此, 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全面、辩证地看待高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

关键词

高兹, 经济理性, 生态理性, 批判

A Study of Gauze's Thought on Ecological Rationality

Dan Huang

School of Marxism,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Received: Jun. 8th, 2025; accepted: Jun. 29th, 2025; published: Jul. 10th, 2025

Abstract

Gauze is one of the core representatives of ecological Marxism. Taking the critique of economic rationality as a starting point, Gauze reveals the alienating effects of economic rationality on nature and social relations, and proposes that a new form of rationality, namely, ecological rationality,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the four aspects of transcendence at the level of concepts, reconfigura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subject,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bor strategy,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However, Götz exaggerates the role of ecological crisis, and his vision of future socialism has a clear utopian color. Therefore, Gauze's eco-Marxist thought should be viewed comprehensively and dialecticall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Keywords

Gauze, Economic Rationality, Ecological Rationality, Critique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逻辑起点：高兹对经济理性的批判

(一) 经济理性的形成

经济理性产生于人类在匮乏条件下为满足需要所进行的理性选择行为。韦伯强调，经济活动并非源自本能欲望，而是个体在资源有限的现实中，为达成主观目的所作出的理性规划和手段选择，这种“目的理性”区别于动物性冲动或技术效率的机械追求，体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核心精神特质[1]。安德烈·高兹指出，经济理性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并非偶然共存，而是内在契合、相辅相成的。在资本主义逻辑主导的社会中，生产的目的已由满足人类基本生活需求转向追求通过市场交换获取利润。正是在这一转变中，经济理性的逻辑逐步建立并发挥主导作用，成为现代经济运作的核心驱动力。这种理性以精确的计算和核算为基础，体现在对劳动效率的持续提升与利润最大化的不断追求之中。在此过程中，价值的衡量标准被简化为单位商品所凝结的劳动时间。这样的标准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以及人与商品之间的文化和情感维度，而将注意力集中于商品的交换价值之上。结果就是人类的生产活动与日常生活逐渐被纳入以效率和收益为导向的量化体系中，行为的合理性被经济上的“有效性”所定义。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理性已深入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生产目的不再在于创造使用价值，而是服务于市场机制，因为更频繁的商品交换意味着更多的利润。在这一逻辑的支配下，生产活动逐渐沦为商品交换的附庸。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难以脱离市场的掌控，他们在依赖市场的同时，也受到市场规则的强烈制约。

高兹批判经济理性，认为其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压抑人的情感与创造性，导致生态破坏与人的异化。他指出，无论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还是当代资本主义，均奉行经济理性，未能摆脱劳动异化、技术异化和消费异化的困境[2]。这一以经济理性为中心的逻辑变迁，还引发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深层价值冲突。传统社会强调“适可而止”的生活态度，而现代资本主义则推崇“越多越好”的增长导向。在资本积累逻辑的推动下，持续生产与交换成为常态，剩余价值的获取成为经济活动的根本目标。由此，衡量“成功”的标准也逐步演变为对金钱和财富的数量化追求。这种标准逐渐脱离了对道德、伦理或权威的依赖，成为一种无需外部确认的普遍尺度。高兹进一步指出，经济理性的逻辑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还逐步渗透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工业化和现代化浪潮地推动下，人们对效率与增长的过度崇尚，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出现异化，其最直接的表现即为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与危机加剧。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为高兹的经济理性批判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高兹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批判路径，指出在经济理性的主导下，人的劳动活动日益异化，劳动者倾向于只从事有经济回报的工作，而那些缺乏直接经济效益的劳动则被忽视。最终，经济理性的普遍化趋势不仅加剧了个体之间的疏离，也加深了社会结构与自然生态之间的裂痕。这种双重异化现象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根本性危机——既是社会性的，又是生态性的。

(二) 经济理性的危害

1. 经济理性加剧了生态危机

在高兹对经济理性的系统性批判中，生态环境所承受的破坏占据了其论述的重要篇幅。他明确指出，当前生态危机的根本诱因之一，正是经济理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主导地位。西方生态现代化虽然表面上提倡“生态理性”，但本质上仍受资本逻辑主导，延续“经济理性”的“越多越好”模式。这种模式追求利润最大化，导致对自然的过度开发和掠夺，加剧生态危机[3]。高兹认为，经济活动的持续扩张并非无条件地正向发展，而是受到自然环境这一外部条件的制约。当经济运作超越了生态系统的承载阈值，其所造成的生态损害可能会抵消甚至超过其创造的经济价值。在这种情况下，表面上的经济增长实质上掩盖了资源枯竭与环境恶化带来的长期代价。因此，他断言，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在于资本主义体制本身及其所推崇的经济理性逻辑。

从根本上看，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体现出价值取向上的对立。前者以“核算”与“计算”为核心机制，其终极目标是利润的持续扩大。经济理性通过提升生产效率、刺激消费欲望与制造市场需求，加速商品在市场中的流通，实现资本的迅速回收与积累。这一逻辑不可避免地依赖对自然资源的大规模掠夺与高强度开发，进而诱发诸如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减少等一系列严重生态问题。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生态理性秉持“适度”和“节制”的原则，其核心理念是“够用即可”与“少即是多”。它强调人类必须重新确立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倡导减少不必要的物质消费，主张以最少的资源投入与人力支出，生产出高质量、可持续的产品，从而在提升生活质量的同时实现生态保护。

高兹通过将这两种理性加以对照，揭示了它们在对资源利用方式上的根本分歧：从生态理性的视角来看，节制生产、延长产品使用寿命、减少能源消耗等举措体现出对资源的尊重和节约，是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必要路径；而在经济理性的视角下，这类做法却常常被视为对经济增长的抑制，甚至被解读为对物资利用率的浪费。这种视角冲突恰恰反映出生态理性与经济理性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高兹进一步指出，经济理性对资源的无止境追求与自然资源本身的有限性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张力。而不同类型的理性组织原则，所引导的经济行为模式也截然不同。因此，若要真正从根源上化解由经济理性所引发的生态危机，就必须突破以资本积累为中心的理性框架，确立一种以生态正义与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生态理性。

2. 经济理性造成了社会危机

(1) 经济理性使劳动和消费发生异化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以经济理性为主导的运行逻辑已引发一系列深层次的社会病态现象。高兹指出，这种理性形态将利润最大化作为一切行为的出发点与归宿，使个体逐渐陷入以经济效益为唯一价值尺度的思维定式之中。高兹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异化进行了深刻地批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理性以利润最大化为核心目标，迫使劳动过程服从资本增殖的逻辑，资本家通过精细分工和技术控制，将工人劳动碎片化、被动化，剥夺其对生产过程的自主权，导致劳动成为异己的力量，工人丧失创造性和主体性[4]。他指出，为追求更高效率与更大利润，劳动被高度分工化，变得日益碎片化、机械化。劳动者被迫从事重复单调的任务，丧失了对劳动整体意义的掌控，劳动不再是实现个体价值的过程，而仅是谋生手段。这不仅抹杀了劳动的创造性，也消解了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与工作热情。此外，劳动分工也进一步导致阶级固化。低技能工人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长期停留于底层岗位，难以突破社会壁垒。更有部分劳动者在技术革新与资本重组中被淘汰，沦为失业者，彻底被排除出生产体系。这种结构性压迫不断加剧社会不平等。此外，资本主义还通过消费主义文化对劳动者实施二次控制。面对劳动中的疏离感与空虚感，个体试图通过消费来获得补偿。高兹称之为“异化消费”——它并非真正满足需求，而是一种资本制造的虚假欲望，使劳动者沉溺于短暂的快感，逐步失去批判现实的能力。这种消费不仅掩盖了劳动异化的根源，也强化了资本逻辑的控制力。经济理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中通过劳动异化与消费异化双重路径，全面塑造并操控个体意识与社会结构。高兹揭示了这一理性模式所带来的深远危害，提醒我们

必须超越以利润为核心的价值导向，探索更具人文关怀与生态意识的替代性理性。

(2) 经济理性使生活世界殖民化

高兹关于经济理性批判的理论在形成过程中深受哈贝马斯“认知－工具理性”批判的影响。他认为，经济理性作为“认知－工具理性”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其不断扩展和渗透不仅导致社会结构的高度功利化，还破坏了教育、社会化及文化传承等依赖生活世界支撑的关系网络。在高兹看来，经济理性的蔓延实际上构成了对生活世界的一种“殖民”，即技术理性入侵到原本应以价值、意义和交往为基础的领域。

具体而言，经济理性以数字化与技术化为主导，促使人类的思维模式发生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潜能被压制，思维变得公式化、工具化，逐渐丧失了对现实的批判能力与自我反省的可能。主体性的削弱使个体难以进行有深度的思考，导致认知活动陷入僵化，进而影响到社会关系的活力，甚至使人际关系沦为一种货币化的交换形式。在此基础上，高兹进一步发展了哈贝马斯的理论，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理性主导下，社会日益表现出程序化、冷漠化与过度效率化的倾向，人的真正需求被边缘化，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逐步被物质交换所取代。这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不仅表现在社会制度与组织层面，更深入影响了个体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

从本质上看，经济理性与“认知－工具理性”有着共同的根源，即对思维活动的形式化处理。这种处理强调逻辑、效率与计算，而忽视了批判、反思与价值判断的维度，从而使人陷入思维上的被动状态。个体逐步丧失多元视角与批判思维的能力，最终成为“经济理性的附庸”。高兹认为，这种由理性单一化带来的“思维殖民”使人日益沦为“单向度的人”——即丧失反思能力、只接受既定规则、无法质疑现存秩序的个体。他的这一观点，既是对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继承，也是对当代资本主义技术统治逻辑的深刻反思。

2. 批判旨归：构建生态理性

(1) 理念层面的超越：从经济理性到生态理性

高兹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未止步于对不平等、剥削等显性现象的谴责，而是深入挖掘其运行机制背后的理性逻辑。他认为，现代社会之所以陷入深重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异化，其根源不在于某一政策或制度的失误，而在于整个社会的组织方式被一种单一的理性范式所主导即经济理性所主导。在这种理性的主导下，一切社会关系都被简化为市场交换，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被量化为成本与收益的权衡。伦理、情感、责任等非经济因素被边缘化，导致社会生活日益工具化和功利化。这种理性不仅导致自然资源的掠夺性使用和生态系统的破坏，也使人本身异化为“经济人”，成为追逐利润机器的附庸。

对此，高兹提出建构生态理性作为根本性的替代方案。生态理性不是对经济理性简单的否定，而是对人类社会组织逻辑的重构。它强调人与自然之间应建立平衡与共生的关系，重视生产的可持续性 with 消费的适度性，主张通过最少的资源投入实现人类真实需求的最大满足[5]。这种理性尊重自然界的限度，反对无节制的扩张和虚假需求的制造。其核心目标不是经济增长本身，而是实现人的自由发展与生态系统的稳定共存。

高兹认为，生态理性所追求的是“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它不鼓励生产过剩和消费主义，而是倡导循环利用、产品耐用、服务共享等生活方式。这一理念层面的转向不仅是一种技术性修正，更是一场价值观的革命，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逻辑的根本超越。

(2) 重构革命力量主体：从传统工人到后工业无产阶级

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工业无产阶级是变革的主力军。然而，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全球化、信息化、智能化的浪潮深刻改变了劳动形态与阶级结构。传统工人阶级逐步失去了集体行动的

空间与政治影响力。因此高兹敏锐地指出,必须重新定义革命的社会基础,重构新的变革主体。在他看来,当代社会中形成了一个结构日益复杂但人数庞大的“新无产阶级”群体。他们包括零工经济从业者、合同工、自由职业者、非典型劳动者及知识边缘劳动者等。这一群体的共同特点是劳动过程的碎片化、不稳定性与缺乏保障,但他们又拥有较高的教育背景与信息传播能力。这使他们具有潜在的社会动员能力和思想觉醒基础。高兹提出,必须赋予这一新兴阶级更多组织权与表达权,使其从“被动适应者”转变为“主动变革者”。通过建立工会、合作社、工人自治委员会等新型组织,使这一群体在企业治理、劳动决策中拥有实际发言权,推动企业内部结构的民主化。

在他看来,当代社会形成了一个结构日益复杂但人数庞大的“新无产阶级”群体。他们包括零工经济从业者、合同工、自由职业者、非典型劳动者及知识边缘劳动者等。这一群体的共同特点是劳动过程的碎片化、不稳定性与缺乏保障,但他们又拥有较高的教育背景与信息传播能力。这使他们具有潜在的社会动员能力和思想觉醒基础。高兹提出,必须赋予这一新兴阶级更多组织权与表达权,使其从“被动适应者”转变为“主动变革者”。通过建立工会、合作社、工人自治委员会等新型组织,使这一群体在企业治理、劳动决策中拥有实际发言权,推动企业内部结构的民主化。

这种新革命主体的构建,不仅可以突破资本主义制度的防御机制,也为实现生态社会主义提供了现实的社会支点。他们的诉求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阶级斗争,而是围绕劳动尊严、生活保障、生态可持续与社会参与权的多维诉求,具有更广泛的动员可能。

(3) 激进的劳工战略与集体行动的回归

在高兹的设想中,劳工战略不仅是一种抵抗机制,更是一种制度重构的起点。他强调,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不仅被商品化和工具化,更在实践中被异化,劳动者逐渐沦为机器的“延伸”,丧失了主体性与创造力。而这种异化最严重的场所,正是现代工厂、流水线中被高度程式化的劳动现场。因此,高兹认为必须将变革的重心重新置于“劳动过程”之上,从内部发起一场以恢复劳动尊严为目标的“制度革命”。

首先,劳工应在工作场所积极开展集体行动,以恢复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权。这种行动不仅限于传统的罢工、抗议,更包括对工作流程的再设计、管理权的协商以及生产决策的民主参与。高兹强调,这不仅是对剥削的抵抗,更是一种制度实验,为替代性生产方式的探索提供空间。他指出,只有在劳动者能够主导生产过程的前提下,劳动才能从异化中解放出来,重新成为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路径。

其次,他主张打破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实现传统工人与新型劳动者之间的组织联合。这种联合不仅能够提升整体谈判力,还能形成跨领域、跨群体的社会联盟,扩大政治动员的基础。此外,他特别强调应将工会组织转变为企业治理中的积极力量,推动其由“反抗者”转向“共同管理者”的角色,使其成为生产流程重构与民主治理的中坚。

在高兹看来,这种激进的劳工战略不仅能够重塑劳资关系,还可以成为生态社会主义制度构建的基础路径。当劳动不再被资本控制而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与生态的可持续性时,一个以人为本、以生态为先的社会形态才有可能真正实现。

(4) 文化批判与新生活方式的构建

高兹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远不止于经济层面。他深刻洞察到资本主义不仅通过制度控制劳动和资源,还通过文化机制塑造人们的欲望、观念与生活方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表现就是消费主义文化。这种文化以商品作为社会认同的载体,将人的价值、尊严、成功感和幸福感全部绑定在可见的消费行为上。人们在商场与屏幕之间流转,试图通过“买更多”来实现“成为更多”,最终却陷入无止境的欲望链条之中。

高兹认为,这种文化逻辑是资本主义实现社会控制的高级形式。它通过广告、媒体、教育等手段构

建虚假的需求体系，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丧失批判意识，将异化的消费行为视为生活的全部内容。这不仅破坏了人的精神完整性，也导致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掠夺，加剧了生态危机。

对此，他提出必须推进文化层面的“去殖民化”，构建一种以生态节制与创造性劳动为核心的“新生活方式”。这种方式强调富有生产性的闲暇，即不是无所事事的放纵，而是在闲暇中进行精神充实与社会连接。他强调应重视劳动中非功利性的创造与协作价值，恢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非工具性关系。

同时，高兹提倡低消费高质量的生活方式，反对以物质堆积和快速更新为荣，倡导产品耐用、生活简朴、价值多元。他指出，真正可持续的社会应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为前提，而不是通过不断制造新需求来维系经济运行。在这一过程中，教育、艺术、公共空间的重建将成为文化转型的重要支点，它们能够唤醒人们对非物质价值的感知，激发创造力与公共精神。

高兹提出的是一种生态社会主义文化形态，在这种文化中，幸福不再与消费挂钩，而是通过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与他人的深度联结，以及对自我内在潜能的实现来定义。这不仅是一场文化的更新，更是一场对人类存在方式的重塑。

3. 高兹生态理性思想的局限性

(一) 夸大了生态危机的作用

高兹在其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中将生态危机置于当代社会诸多危机的核心地位，认为唯有突破经济理性的主导地位，确立生态理性为社会组织的基础，方能从根本上化解生态危机，进而缓解甚至解决社会层面的多重矛盾。这一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人类对生态环境重要性的认识，推动了生态意识的提升，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然而，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高兹在理论构建中存在对生态危机作用的某种程度上的夸大，其对社会基本矛盾的把握存在明显偏差。

具体而言，高兹忽视了社会制度层面特别是物质生产方式对生态问题的决定性影响，未能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即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冲突——出发来剖析生态危机的深层成因。他认为，随着人类社会步入后工业阶段，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逐渐失去解释力，生态危机已经取代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这种观点将当代社会诸多矛盾的根源简化为生态系统的失衡，进而忽视了生态危机背后所体现的资本积累逻辑与制度性掠夺本质[6]。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并未随着时代发展而消解，其基本逻辑依然清晰存在：在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驱动下，资本持续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与扩大再生产，这种无限扩张的逻辑不仅造成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也必然导致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与环境破坏。因此，生态危机并非与经济危机相分离、甚至取而代之的新型危机，而是资本主义制度运行逻辑的必然结果，是其制度性矛盾在自然领域的延伸和外化。将生态危机与制度性经济危机割裂来看，势必导致对问题根源的遮蔽与理论分析的片面。

(二) 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

高兹在构建其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时，试图打破资本主义社会对劳动的异化控制，建立一种以生态理性为基础的替代性社会形态。然而，在其构想的未来社会图景中，部分观点因脱离现实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和阶级结构，而呈现出明显的乌托邦色彩。

高兹设想，在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将拥有一种新的生活模式，即在国家或社会提供的政治性收入保障下，每个人只需从事较短时间的劳动，便可满足其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这样一种劳动自由的设想，体现了对人类自由发展的高度期待，然而，其背后所依赖的经济条件与制度保障却未得到严密论证。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社会制度的根本转型难以在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生产关系变革的前提下自发实现。高兹的设想忽略了社会基本再生产过程的客观要求，即满足人类基本生活资料所需的劳动总量是由社会整体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7]。在尚未实现高度自动化生产与全民民主控制生产资料的现实条件下，试图通过人为压缩劳动时间而实现普遍自由，将不可避免地削弱社会整体的物质基础。同时，高兹所设想的生态社会主义强调控制物质欲望、主张“少而好”的生活原则，虽然在批判消费主义文化方面具有启发意义，但在构建社会制度时若过分依赖对个体自我节制与生态伦理的诉求，势必缺乏制度性保障与阶级动力的支撑，难以动员现实中被压迫阶层广泛参与社会变革。

归根结底，尽管高兹对劳动自由与生态伦理的倡导展现了人道主义关怀，但由于缺乏对社会物质生产条件与阶级关系的深入分析，其生态社会主义设想最终难以超越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在没有实现生产关系根本变革与劳动者掌握生产资料的前提下，试图通过制度设计与伦理引导建构“自由人的联合体”，难以在现实中得到实践的支撑。

4. 结语

高兹以对经济理性的批判为出发点，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多角度的深刻反思，并据此提出了以生态理性为基础构建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问题不仅仅在于经济制度本身，更在于其背后所依赖的发展逻辑。因此，他主张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也要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强调转变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知方式。

然而，受限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理论立场，高兹的生态理性思想忽视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矛盾以及社会制度对生态危机的根本性影响，更多是从伦理和文化层面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因此，我们在评价高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时，应持一种客观、全面、辩证的态度，既肯定其对生态问题的深刻关注，也要看到其理论与唯物史观之间的张力。

参考文献

- [1] 王晓旭. 再论韦伯的经济理性批判: 基于“理想类型”法[J].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2024(1): 314-329.
- [2] 李娟, 王谷琳. 高兹对经济理性批判的三维透视[J].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7(6): 7-11.
- [3] 李彦龙, 王磊. 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的理性选择——从“经济理性”“生态理性”到“生态经济理性”[J]. 前沿, 2024(3): 14-22.
- [4] 刘歆, 苏百义, 张新. 安德烈·高兹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内在逻辑[J].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0, 38(3): 37-41.
- [5] 张钰, 袁祖社. 从经济理性到生态理性: 绿色发展理念的生成逻辑与实践超越[J]. 广西社会科学, 2017(5): 58-62.
- [6] 陈华兴, 叶华娟. 高兹生态社会主义实现路径评析[J]. 理论视野, 2021(6): 91-96.
- [7] 冯旺舟. 资本逻辑批判与走向希望的乌托邦——安德烈·高兹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总体探析[J]. 学术交流, 2020(9): 13-25.